

孙志祥◎著

文本意识形态批评分析
及其翻译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46
31

文本意识形态批评分析 及其翻译研究

孙志祥◎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本意识形态批评分析及其翻译研究/孙志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04 - 8400 - 4

I. 文… II. 孙… III. 文学—翻译—研究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3679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a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7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意识形态成为翻译学的一个关注对象应归功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一度成为主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译学研究开始式微，因为它对一个译文文本在译入语文化中如何诞生、生产和发挥其社会功能完全不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是它这种理论天生的缺陷。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解构主义思潮横扫译学界，一股强劲的怀疑与否定、反思与批判的解构之风给我们已近僵死的旧范式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让我们认识到翻译活动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活动，更不是文人雅士们在书斋中的消遣，而是与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着翻译活动的整个环节。这是很有启发性的，继而一种新的译学研究范式，即解构主义范式开始成为主流。人们开始关注文本外的诸多因素，如主体性问题、权力话语、文化因素、意识形态，甚至后殖民问题、女权主义等都纷纷与译学结缘，形成所谓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陈旧疆界，丰富了译学研究的内容，但它们也有着一个通病，那就是只关心外部因素而未能深入到文本内部去。如果说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有

舍外求内的倾向，那么解构主义范式则反其道而行之，是舍内而求外。这使得这种范式犹如夏天的急雨，来势凶猛，其退亦速，持续几年就难以为继了。究其主要原因是它们都有着一个通病：它们不与文本结合，只打外围仗，因而难以深入也难以持久，往往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谈论一些与翻译学相关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站在翻译学的立场上来思考如何利用这些理论来真正解决翻译中的问题，也没有找到与译学的切入点深入进去，所以这类文章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针对这种情况我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就是“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其主旨就是批评那些只谈论邻居家的事儿而不解决自己家的实际问题的现象，并且指出内外结合的研究方法。意识形态问题在译学中的讨论也是如此。解构主义范式的研究只是揭示出翻译活动同创作活动一样是受社会意识形态所操控的。如果只做到这一步，那就只能把翻译活动置于完全被动的地位，翻译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又何在呢？又如何表现呢？这样做的结果又如何使译学研究本身深入和拓展呢？我在《翻译批评学引论》一书中也曾指出，意识形态问题在翻译中进行研究必须从文本内部找到依据，它是一种内部批评，而不是一种外部批评。所谓内部就是必须与文本密切结合，与语言问题亲密挂钩。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巴赫金说得太正确了，如果离开文本，离开语言，那种意识形态只能是空的。起码在译学中这种研究意识形态的方法几近于空谈。我们知道，解构主义范式中所谈的操控性意识形态只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是具有落后性、保守性、虚伪性和欺骗性的。而引进异文化的文本正是引进新的、

在译入语社会来看是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引进和译介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就是揭露主流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落后性，用新的思想来警醒久被主流意识形态麻痹和欺骗的人民，即抵制主流意识形态。这是一切进步性和革命性的译作的社会功能所在，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而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交锋与对峙恰恰在文本之中，隐含于语言之中。所以，如何从文本的字里行间来发现这些意识形态因素，分析它们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必须深入文本和语言中去，对它进行“政治阅读”，对文本进行解释/再解释。只有这样才能看到问题所在。可是如何进行这种分析和解读呢？孙志祥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标志性的研究。他以《骆驼祥子》的三个译本为主要语料，借用批评话语分析和深度解释学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包括语境分析、话语/形式分析和解释/再解释这三个维度的文本意识形态批评分析解释方法论构架，并用这一构架分析了文本的词汇和语法等层面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得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如他指出，不仅译者意识形态内部结构并不是稳固不变的，而且译者的选择并不一定是意识形态或其他外部因素的有意识的结果，它可能是译者无意识的选择，因为同一社会基础上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的统一，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对某个时代的宰制意识形态的研究确立译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同时，意识形态的翻译是文本内部意识形态和文本外意识形态博弈的过程和结果。他的这些结论无疑对我们很有启发。后一方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而前一方面正是批评了我们以往研究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错误倾向。

孙志祥的研究是深入细致的，更主要的是开创了一个把意识形态研究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契合点。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或者叫做学科互涉的重要问题就在于寻找它们的结合

点。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深入下去，孙志祥开了个好头。看到他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作为他的导师，我是由衷地高兴。希望他在已有开端的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盼望着更多的成果问世。

是为序。

吕 俊

于南京龙江寓所

2009年11月29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研究对象	(2)
第二节 选题的研究意义	(7)
第三节 选题的研究方法	(10)
第四节 本书的组织架构	(13)
第二章 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概略	(16)
第一节 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的兴起	(16)
一 描述翻译、翻译规范与意识形态研究	(17)
二 翻译操控派与意识形态研究	(21)
第二节 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中的意识 形态概念	(24)
一 意识形态概念的混杂性	(24)
二 意识形态作用的二元划分和消极社会 功能的夸大	(28)
第三节 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中的视角选择	(33)
一 翻译文本的选择	(33)
二 翻译策略的选择	(35)
三 语言外部与内部研究视角的选择	(36)

第四节	小结	(38)
第三章	文本意识形态批评分析和解释的方法论架构	(40)
第一节	CDA 和深度解释学视阈下的语言和意识形态	(41)
一	语言学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研究:从缺失到核心	(42)
二	意识形态分析:从直觉描述到内部结构研究	(45)
三	意识形态概念:定位和不足	(47)
第二节	CDA 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	(54)
一	批评语言学的文本分析重点	(55)
二	社会文化途径的话语三维模型	(56)
三	CDA 方法论架构的不足	(58)
第三节	深度解释学的意识形态分析层面	(61)
一	社会历史分析	(61)
二	形式或话语分析	(62)
三	解释/再解释	(63)
四	深度解释学方法论架构的不足	(65)
第四节	意识形态运行模式和整体原则	(65)
一	深度解释学的意识形态运行模式和建构谋略	(66)
二	社会认知途径的扬内抑外整体原则	(67)
三	文本意识形态批评分析的意识形态模式和谋略	(68)
第五节	文本意识形态的批评分析解释方法论架构	(70)

一	架构的三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	(70)
二	意识形态翻译与翻译意识形态	(73)
第六节	小结	(76)
第四章	分类系统的意识形态与翻译	(78)
第一节	分类系统的意识形态意义理据	(79)
一	分类系统和思维	(79)
二	分类的自然基础和常识化	(81)
三	分类和控制	(84)
第二节	分类系统中的意识形态建构谋略	(85)
一	过度词化	(86)
二	重新词化	(88)
三	偏向化命名	(89)
第三节	分类的意识形态意义与翻译	(91)
一	不对称权力关系性质的改变	(93)
二	意识形态建构谋略的整合	(99)
第四节	小结	(102)
第五章	及物性系统的意识形态与翻译	(105)
第一节	及物性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意义潜势来源 ...	(106)
一	物质过程	(106)
二	心理过程	(107)
三	关系过程	(108)
第二节	语言过程的选择与意识形态意义的编织 ...	(108)
一	过程的选择	(108)
二	参与者的选择	(112)
第三节	语态的选择与意识形态意义的建构	(114)

一	英汉语被动语态的过程小句结构	(114)
二	被动语态使用的动态性	(115)
三	参与者的隐现及其意识形态意义	(116)
第四节	语言过程和现实的错位与翻译	(119)
一	语义角色的隐现	(119)
二	信息焦点的转移	(125)
第五节	小结	(129)
第六章	情态系统的意识形态与翻译	(131)
第一节	情态的意识形态意义理据	(132)
一	情态与控制	(132)
二	“归一性”和磋商空间	(133)
三	情态表达手段的拓展	(134)
第二节	情态与意识形态意义的建构	(135)
一	情态与知识/权力基础	(135)
二	情态的主/客观取向与权力	(138)
三	情态、视点与人际关系	(140)
第三节	情态的意识形态意义与翻译	(145)
一	命题情态的意识形态意义翻译	(146)
二	人际关系的建构与意识形态意义的翻译 ...	(150)
第四节	小结	(153)
第七章	转换系统的意识形态与翻译	(154)
第一节	现实关系的隐喻表达	(155)
一	词汇层的隐喻化转换	(156)
二	语法层的隐喻化转换	(158)
第二节	转换的意识形态运行模式和谋略	(160)

一	转换与语境	(161)
二	虚饰化和具体化	(163)
三	作为过程和结果的转换	(164)
第三节	名物化的意识形态意义建构	(167)
一	掩饰施动者的问题角色	(168)
二	操控社会和文化焦点	(169)
三	知识和观点的常识化	(170)
第四节	名物化意识形态意义潜势的翻译	(170)
一	英汉语名物化形式差异	(171)
二	名物化意识形态意义潜势的翻译	(173)
第五节	小结	(177)
第八章	结语	(179)
参考文献		(185)
致 谢		(203)
CONTENTS		(204)

第一章

绪 论

有关意识形态的研究可谓几度兴衰，几度浮沉。20 世纪 50 年代，在西方曾经掀起过意识形态终结论。宣扬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家是在特殊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在他们（如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等）看来，意识形态就是对社会历史的总观点、对社会不满的激进的革命学说、空想的观点等。这种思潮至少蕴含着三大理论误区。其一，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是根本对立的关系；其二，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意识形态；其三，马克思主义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丧失、理性的衰落、发达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成熟和新的实用主义等一定会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意识形态研究又再次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概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并不陌生。毛泽东（1938）在《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中最初运用了意识形态这个词，其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运用“文化”、“观点形态”和“思想体系”等概念全面地阐述了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时至今日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仍然与“红色”和“革命”等联想或符号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不可否认，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意

意识形态观在深深地指引和影响着我们，并且也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只是一种司空见惯、似懂非懂的模糊概念，这些思想资源需要我们认真梳理、研究和创新。

意识形态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它与社会经济条件、思想传统、社会分工、日常生活和语言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包含了与语言的文化复杂性密切相关的所有问题，具有丰富久远的历史，并且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甚或相互矛盾的意义。（季广茂，2005a：5）理论上讲，无论是在翻译的文化转向后的今天，还是在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指针的过去，翻译研究都不应缺少对于意识形态维度的探索。因为，意识形态不仅存现于语言之外，而且存现于语言之内。“语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而不是铁板一块的系统；符号则就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媒介，因为没有符号任何价值或观点都无法存在。”（伊格尔顿，2007：114）另外，意识形态常常是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应该成为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之一。但是，或许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意识形态我们大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叹。意识形态维度在翻译研究中经历了长期的缺位沉寂以后，终于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潮中激起了浪花。

第一节 选题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选题为《文本意识形态批评分析及其翻译研究》。顾名思义，意识形态问题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意识形态与各种象征形式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不仅存在于文本之中，而且存在于言谈话语、仪式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和艺术作品等象征形

式之中。将文本意识形态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关注的是文本以及文本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功能。换言之,我们所关注的意识形态一是主要限于文本,二是具有翻译导向。当然,对于文本自身有必要作一个界定。这不仅仅是因为文本、语篇和话语这三个名词常常引起混淆,而更多的是因为本研究中的文本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色彩。首先,本研究中的文本具有结构主义的部分特征,文本中的特定结构和形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意义具有相对可及性,是译者的出发点和依托。就文本和作品而言,文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学或者作品。作品是静态的事物,而文本只是在话语运动中的存在。从能指和所指的角度来看,文本是能指的领域,对所指进行着无限的延异。就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文本不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文本和文本之间存在相互指涉的关系,但是没有相互支配和权力操控的关系。(汪民安,2005:142—143) 翻译过程中对于文本的阅读因而也不仅是一种阅读作品那种文化消费,而且是译者和作者等相关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比较、调整和竞争,是文本的再生产和实践活动。

斯奈尔·霍恩比(M. Snell-Hornby, 2006)曾经指出,在翻译的文化转向以后,“转向”似乎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用语。她对于梁永光(M. Wing-Kwong Leung)所提出的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转向”则不以为然。她认为这一问题实质上和她所讨论的“翻译帝国”(Imperial eyes)是密切相关的,即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梁永光(2006)指出翻译研究不仅要关注文化问题,同时还应关注意识形态导向的翻译行为。事实上,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确实关注翻译背后的不对称权力关系,而且意识形态和权力又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本书意在真正将意识形态纳入

翻译研究使之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维度。结合翻译研究范式^①的划分纵观翻译研究的历程,可以发现意识形态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维度的历史并不为长,经历了朦胧阶段、缺失阶段和发展阶段。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之前,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维度一直处于一种朦胧状态。纵观中国的翻译研究历程,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经历了四大时期或阶段,即形成时期、转折时期、发展时期和鼎盛时期,并且形成了十大重要标志性学说,即古代以支谦、支谶为代表的“文质说”,严复的“信、达、雅”说,鲁迅的“信顺说”,郭沫若的“翻译创作论”,林语堂的“翻译美学论”,朱光潜的“翻译艺术论”,茅盾的“艺术创作性翻译论”,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和焦菊隐的“整体(全局)论”,等等。尽管在这些传统译论中,偶尔见到有关意识形态的零星论述,但是没有系统的阐述。罗家伦(1918)在对翻译工作者提出的“四条意见”中强调翻译材料选择的社会意义,但是没有直接使用意识形态这样的术语,指出:“最重要的就是选择材料。……小说是要改良社会的,所以取的异国,总要可以借鉴,合于这个宗旨的为妙。”(转引自陈福康,2000:208)焦菊隐(1951)在讨论直译和意译的时候,强调译者服从于作者的思想过程,“进一步掌握原作者的思想过程,领

① 按照翻译理论所隐含的哲学观、语言观和理性观等变量,吕俊和侯向群(2006)提出,翻译研究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语文学范式为主的翻译研究阶段(包括传统的翻译研究和传统的文艺学派翻译研究)、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以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为主的翻译研究阶段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解构主义的多元范式为特征的翻译研究阶段(包括翻译目的论、操控学派、文化学派、诠释学派、后殖民主义甚至女权主义译学研究等)。其他关于翻译研究学派或流派划分的观点还有奈达(1976/1984)、陈德鸿和张南峰(2000)、潘文国(2002)等。

悟他的意识形态，立场，态度，精神，民族与地方的特征的色彩，情感的波动，他个人的特殊表现手法及其重心”。他看到了作者的意识形态等因素，目的是整体地把握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在译文中进行整体的传达。但是没有提及文本、译者及其所处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等因素。语文学范式的翻译研究阶段的特点是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指导，既没有系统的语言学理论，也没有系统的文艺理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字句的翻译方法（如直译与意译的讨论）、风格的传达（风格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讨论）、诗歌的可译性与翻译的标准（如信达雅、神似、化境）等问题上。其研究方法主要是一种直觉主义的、以内省或者主观体验和感悟为主，比较少地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吕俊、侯向群，2006：54—55）。在这种研究范式下，翻译是靠译者的天赋，因而存在重主体而轻客体的倾向。无论文本的意识形态、译者的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没有作为一个显性的向度进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翻译研究阶段是以语言学理论为中心的翻译研究。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处于一种缺失状态。典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是围绕“等值”而进行的研究，一直试图找到语言与语言之间翻译的等值方法，试图在音素、词素、词、句子、语篇等层面求得翻译等值，在内容和形式上寻求语言之间特别是形式上的翻译等值。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卡特福特（Catford）认为翻译的本质就在于确立等值关系，用等值的译文文本材料去替换原语的文本材料，其中心任务就是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纽马克（Newmark）在讨论翻译批评标准的时候，提出评判翻译的标准还是译文是否准确精练地再现了原作的意义，特别是原作表现的客观真实。前苏联翻译界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费道罗夫提出了恰切对等的概念，认为译文与原文之